

臺灣山地原住民土地與生活之圈地圈生運動： 日本殖民國家—資本下的人群分類與「理蕃」*

中村 平

摘 要

不管對日本人或者臺灣原住民而言，在使殖民主義成為可能的條件中，規定著殖民經驗（「理蕃」的歷史經驗）和記憶。「殖民化（Colonization）的條件」（G. Walker）在於，以「人類學知識」的成立和普及為槓桿，確立了殖民差異，以及其實體化的過程。換言之，使殖民主義成為可能的條件是在於知識論上，即確定日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及被統治者的「種/族」分類等的殖民差異。差異的知識論確定工作，密切關連於殖民國家所進行的資本主義近代。殖民主義通過知識論連續面（平臺）的形成，將醞釀危機且翻譯困難之「純異質性」進行了翻譯。在此基礎上，殖民主義憑藉著賦役勞動的形式（中村勝），促使了將勞動力商品化的國民出現。另外，本文在基礎上，思考何謂殖民者想像與分享（partage）被殖民者的經驗，或者繼承經驗；帶著日本人知識分子的立場，去考察日本殖民統治責任的問題。筆者主張必須兼顧負起殖民地責任的兩個路徑：一是釐清殖民統治和持續至今的殖民主義機制；二是分享圍繞統治（特別是暴力的）經驗的記憶。

關鍵詞：殖民主義，圈地運動＝原始積累，（殖民）國家—資本，理蕃，殖民差異

* 本稿是承蒙日本學術振興會基盤研究(A)「帝國日本的移動與動員」以及基盤研究(C)「臺灣原住民的『民族』自治」的經費補助而進行。另外，關於中文文章修飾部分，承蒙劉瑞超先生的協助，在此表達謝意。

一、序言：統治機制、記憶的分享、與殖民統治責任

「我們不會爲了別人服役勞動」

《捕囚》（中村勝 2009: 587-97）。

歷史人類學者中村勝在追究「理蕃」日本殖民政策的本質，思索布農的拉馬達星星或泰雅的 *Wilan Taya* 等臺灣原住民行動時，體認到他們的主體性，於是在其浩瀚的著作《捕囚：關於殖民國家臺灣的主體自然與社會權力的歷史人類學》（2009）中記述下上面這句話。《捕囚》一書採取了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脈絡中的角度，檢討了「理蕃」機制，並把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責任當作研究關懷的問題。上述引用，亦是體認到臺灣原住民的主體自然，¹ 進而喚起殖民暴力的記憶和經驗的言詞。

自拉馬達星星（伊加諾萬 *Ikanoban* 社「頭目」，生年不詳）起，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所謂霧社鬥爭這段期間，「未歸順」的臺灣原住民「頭目勢力者」，保持著不屈服於日本統治的態度。根據殖民者留下的紀錄（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1928]: 81），臺東廳臺東支廳新武路「更深山」（原文「以奧」）地區的拉馬達星星等人，於1921年5月在「凱莫斯 *Kaimosu* 社」附近有過這樣的談話：

日本把道路延長到新武路，設置駐在所，雖然說以實施交易和醫療來給我們方便，但這只是藉口。我們同族沒有戰敗過，日本任性地到深山，把我們當做勞工使役，侵入我們的領域，是非常遺憾的事。即使我們拒

-
1. 原文爲「主體的自然」。中村以馬克思在〈寄給查蘇利奇（Засулич）的信草稿〉中使用的「自然生命力」爲基礎，創用此語彙，意指：臺灣山地原住民在被國家權力籠罩之前的主體性所在，亦即在環境物質諸力量的互相作用下，經營了「自然生（活）」這種狀況。另外，《捕囚》裡的「山地原住民」，原文爲「高地先住民」，與中華民國法律下「山地／平地原住民」之分類無關。

絕，但仍然被強迫出役，我們乖乖地從事工作四、五天，讓警備員放心之後，深夜試圖奪去他們的槍枝彈藥。（中村勝 2009: 590）

同年12月，新武路道路開削搜索隊的原新次郎警部與巡查部長，遭拉馬達星星等襲擊，原被鹹首。這印證了上述拉馬達星星的話是有意義的。大約四年後的1926年1月，拉馬達星星拒絕官憲要求的「出面」，五年前他拒絕出役的態度，到此更是徹底了（同上引：591）。之後到1932年12月拉馬達星星被警察逮捕殺害為止，他一直活著並持續抵抗（徐如林、楊南郡 2010）。關於 *Wilan Taya*（「南澳蕃 *Piyabau* 社」頭目），本文將不贅言，請讀者參閱《捕囚》。「我們不會爲了別人服役勞動」，本文開頭的這句話，響徹於上述殖民者留下來的史料中，可以說呈現了臺灣原住民的一種主體性。²

拉馬達星星在臺灣山地從容不迫地活動，此事蹟倘若能被讀者銘記於心，它即成爲「我們」的「記憶」。日本人對臺灣的認知，一向是帶著人種主義的（松田京子 20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和接下來的冷戰體制中，使日本人忘卻了殖民地臺灣，因此對於日本人而言，去殖民（decolonization）是在或多或少地碰觸和感知如上述臺灣原住民的主體性所在的同時，探究「理蕃」支配的機制。殖民差異（colonial difference）的形成和實體化，分裂了臺灣原住民和日本人，而探究支配的機制、以及分享（partage）在殖民暴力裡呈現的原住民主體性（參中村平 2011），可以使被分裂的兩者重逢，也是追求兩者以非殖民主義的形態連結的可能性。

描寫臺灣原住民在「理蕃」下被支配的機制和記憶這兩者，對臺灣原住民和日本人、其他「臺灣人」、及其周圍人們的去殖民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我們要想起，「理蕃」是包含人種主義的殖民主義，也是殖民統治，資本與國家的

-
2. 我們不能將這種拉馬達星星等的主體性敘述，和日本1950–60年代的民族抵抗史觀敘述視爲同等。日本史學當時的民族抵抗史觀，往往將積極的抵抗視爲民族主體性的所在，但就像中村勝的《捕囚》精煉出來「受動性實踐」概念，目前需要討論的是，以傳統文化裝置來反應外來的刺激，把這種被動性層面放在其視野的主體性概念（參中村平 2011）。有關這種當主體在抵抗時具有的被動層面，承蒙山本達也的建議。

力量在此運作著；同時，抵抗「理蕃」的去殖民力量也在此間呈現著。探究「理蕃」的歷史經驗，是身處當代正在生成的「我們」在喚起這些記憶，這同樣也是去殖民的概念與實踐。拉馬達星星的記憶並不只是臺灣原住民的，也是重新生成的「我們」——試著感知這些殖民記憶的「我們」——的內在之一，而且這個「我們」已經超越殖民差異範例下的分類範疇。《捕囚》的中村勝，從史料中聽到了「我們不會爲了別人服役勞動」之臺灣原住民心聲。殖民政策將被殖民者分裂，以便進行統治，一方面原住民在殖民者日本人強勢推行勞動、教育、以及皇民化生活方式之中反對這些措施，一方面原住民爲了生存，被迫捲入其中，這兩者間產生了分離裂開。「不會爲了別人服役勞動」意識的背後，有了臺灣原住民傳統的主體自然，和《自然力的世界》（中村勝 2012）。觸及到這些記憶的場域，才是具有去殖民力量的接觸領域（contact zone），亦即，持續描寫與讀取「理蕃」機制，以及相關歷史經驗和記憶的場域，成爲一種接觸領域，而這也開啓了新的政治空間（參 Pratt 1992；中村平 2013a）。

本文站在中村《捕囚》的成果上，將其所說圈地概念的射程，與 G. Walker 等馬克思主義後殖民議論結合，試圖有助於理解，被「理蕃」的臺灣山地原住民之歷史經驗。

二、臺灣山地原住民土地與生活之圈地圈生運動

（一）G. Walker 的圈地概念與殖民差異概念

與中村《捕囚》的分析概念相關連者，近年有 Gavin Walker (2010, 2011a, 2011b, 2012)。他將 K. Marx 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概念，結合西方後殖民研究，提出了重要的視角。Walker 把「圈地運動」概念的核心，當做「殖民差異」(colonial difference) 的創造和累積。他認爲，資本把「完全差異」翻譯成可以理解的「複數的差異」。本文擬分析此翻譯的過程，同時也分析日本初期人類學知識創造出日語中「人種」、「種族」以及「部族」等概念的過程（見第二節）。資本這種翻譯的力量，同時在殖民國家裡，構成了圈地運動過程，抑

或「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重要機制。這些差異成為殖民政府在統治上的知識論基礎，並且它們在殖民主義歷史裡被實體化。這即是在殖民地臺灣展開「理蕃」的核心機制。

民族雖然被認為是想像的產物，但其實它是在歧視或壓抑(殖民主義)中，也在法律裡被實體化，於是 Walker 及酒井直樹等人(Sakai and Solomon 2006) 將之重新理解為殖民差異(colonial difference)。當思考到後殖民歷史的不可收回時，我們可以了解，對臺灣原住民而言，一旦推動以民族為參照架構的政治，便關連到日本和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即日本一向行使殖民主義；二戰後中華民國則以中華民族之名試圖統合國家。而這也是原住民和多數者(majority)去殖民運動的核心。但同時我們應該去理解，現行民族概念其實是殖民差異的實體化，那是在近代視殖民為正當化的資本主義國家體制之下所形成的民族歷史，這些對思考何謂從根源上進行去殖民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Walker 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民族問題」的回歸〉的論文(2012)中，提醒我們注意在所謂後殖民研究領域中的兩個觀點：第一是(全球)資本主義和原始積累概念；第二是知識論問題，就是把各種「差異」翻譯成可以認識的，進而把它當作統治基礎的。Walker 依據 S. Žižek 的批判，認為後殖民主義往往流於使認同政治實體化，因此 Walker 試圖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後殖民主義兩者。資本創造地方性的東西，形成種差，並累積體系性差異。換言之，資本為了使地球再 code (符號體系)化，把現存各種因素，從「純粹異質的流派」圖表化為「種差性」(同上引：130-1)。³ Walker 將之稱為「從純粹異質性的領域形成特殊差異的連鎖」(同上引：126)。這種資本的展開，與殖民統治和其後也延續下來的殖民主義形成勾結，「民族(國民)」在此實體化。資本的邏輯是在「翻譯」問題的振幅中擴大而來，民族或種族之間差異的「界線」並非自始存在的，而是透過翻譯的行為初次出現(同上引：139)。

3. 「種差性」的英語是 specificity / specific difference(筆者與作者 Walker 進行 Email 確認)。

酒井直樹把同一件事說成：將文化差異的單獨性(singularity)，還原到特殊項目之間的差異(1997: 200-01，另外參見酒井直樹 2007)。

Walker所謂的後殖民理論的課題，就是去釐清資本主義的力量。資本具有一邊寄生於「民族」差異、「殖民」差異和「文明」差異等之型態中，一邊使自己領土化，進而擴大之力量。而我們必須去釐清資本自我擴大的「秘術性質」。各種差異的實體化（歷史性物化），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後殖民研究的一個核心便是，這種差異的歷史性物化是如何成為世界性規模資本展開中不可缺的部分（同上引：134）。

Walker所說的翻譯，也是G. Deleuze和F. Guattari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一書中討論的「國家捕獲」的問題。「由國家或者捕獲裝置所開始的，是使原始符號體系超code化的全體符號學」（Deleuze and Guattari 2010: 193）。既有的各種社會型態，在原始積累過程不被破壞，而被重新描寫、被超code化，與資本主義「新的社會靈魂」（Marx 2005: 549）一起再配置（Walker 2011b: 389-91）。原始積累是馬克思從西歐封建社會的解體過程來思考所提出的，是將生產者從土地等生產手段進行切割，同時，模仿在神學中亞當吃蘋果的原罪概念。原始積累是個開始，是在「貧困的大多數人」和「富裕的少數人」之間開始的（Marx 2005: 501-75. 第24章「所謂原始資本積累」）。換言之，是由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過渡到資本主義模式的過程（熊野純彥 2013: 277）；也是「既有條件的暴力性收奪、圈地運動和捕獲的過程」（Walker 2010: 121）。

但是某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特別是Rosa Luxemburg主張，原始積累不是像馬克思描繪的一樣是在某個期間內，而是正在進行的，是沒有終止不斷進行的過程。「原始積累是對外的收奪，與對外暴力之不斷的過程」（Walker 2011a: 132）。實際上實施資本的原始積累者乃是國家。萱野稔人（2005: 248）說：「原始積累只有通過國家暴力才可行」。Deleuze和Guattari（2010: 198）曾主張：「一般而言，每當捕獲裝置被組成，並且伴隨特殊的暴力之時，原始積累便存在」。原始積累所需要的是，以暴力來建設均質的、「被殖民化的」空間（同上引：355）。

上述Walker的圈地運動＝原始積累和殖民差異論，在熊野純彥（2013: 277）探討馬克思「資本論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出其呼應。原始積累的暴力

是「資本制本身的暴力性」，它「一方面是抹滅差異的暴力；另一方面是產生差異的同時收回它的暴力」。後者的「差異」即是上述Walker的「種差性」，換言之是資本所翻譯的殖民差異。

（二）中村勝的圈地圈生、和原收奪概念

當在日本和臺灣雙方一起進行去殖民運動的時候，去思考日本的殖民國家—資本複合體，以及其在臺灣山地原住民的土地和生活的圈地運動＝原始積累，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中村勝近年的著作（2003, 2009, 2012）都討論了這個觀點。⁴ 中村將殖民（化）理解成土地和生活⁵的「圈地圈生」運動、以及「原收奪」的概念。⁶ 本文將馬克斯以來的用語「enclosure of land and life」，翻譯成「圈地」和「圈生」。同時，中村對於日帝統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及其土地的關係，觀察到了包含「馘首—祀首（原文爲首祀り）」的「民習」之自然力或主體自然。此主體自然，雖然包含著對自然的手段之「本來的暴力」，但是殖民國家資本則從原住民剝奪此暴力（中村勝 2009: 113）。過去中文翻譯爲「圈地運動」的enclosure概念、抑或原始積累，可以理解爲土地和生活的「圈地圈生」。中村實證地精煉出來的「捕囚」現象，就是指，該過程受到殖民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所強制規範著。

1. 圈（土）地（enclosure of land）

「理蕃」的基礎，是把原住民傳統的土地視爲國家所有。「在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在全部過程的基礎上，都有著從農村生產者之農民身上奪取土地一事」（Marx 2005: 505）。眾所周知，1895年「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確立了把「蕃地」視爲「無主地」，且成爲國有化的原則（中村勝 2003: 261-5）。在此國有化政策上進行了山地原住民「移住—集團化」，而且把生活

4. 洪廣冀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從林業史政治生態學的角度，將研究焦點放在宜蘭縣蘭陽溪中上游，那是一部實證歷史的重要著作（參洪廣冀 2006）。

5. 原日文爲「生（せい）」。

6. 原收奪指的也是：「去掉物質代謝的organism」（中村勝 2009: 101）。

範圍圈在「保留地」的政策（同上引：315-70）。在這種國有化政策上，1900年2月頒布的律令7號「有關占有蕃地的律令」，在原則上便禁止「蕃人」以外的人從事開發「蕃地」。這指的是，從「蕃地」的開發排除「本島人」或「土人」（《理蕃誌稿》中的名詞），只允許獲得總督府許可的日本人企業家具有開發權（同上引：326-31）。當時歐美人或漢民族、原住民其實是混雜著從事開發，因此，這項法令應該可以說是從「日本人」的特權立場出發，其中則包含著國族主義的邏輯（同上引：378），⁷ 這樣的設計為的是以暴力為後盾，讓這個開發現場遵循一個統治者建立的秩序。⁸

2. 圈生（活）（enclosure of life）

1960年代後，日文的日本帝國主義研究累積了不少成果，但是在釐清「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性」這個走向中，卻把經濟層面視為優先，在「探究殖民對社會產生各種壓抑的觀點」上顯得過於薄弱（戶邊秀明 2008: 60）。《捕囚》在此意義上，便繼承了經濟史或帝國史的累積成果，中村以生活的原收奪＝圈地圈生概念為主軸，試圖總體性的呈現，戶邊所說的「對社會產生影響的多種壓抑」。

《捕囚》以資本主義批判為基礎，由日臺雙方的資本和天皇制下近代國家日本的殖民主義展開，描寫了日本和臺灣原住民兩者的關係。「捕囚」指的是，殖民國家與日本資本勾結（「殖民國家資本」），此殖民國家對臺灣原住民所進行的土地收奪、及在此基礎上作為強制「出役」的勞動力搾取、向被統制「蕃社」的「移住－集團化」、和以作為「社會的學校化」的「蕃童」教育為中心而

7. 「天皇制家族主義」與中村指出所謂「『恩』的歧視世界」的創造（同上引：411-12），這兩點在日本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推行與實踐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8. 例如，賽夏族日阿拐（1840-1903年）等人發動的南庄事件（1902年），可以將之視為日本人製腦業者與總督府壓迫性土地－經濟政策所引起的。日阿拐把土地或腦寮租給漢人等，收回所謂山工銀的租金，累積財產，同時自己也投入製腦業。但由於日阿拐在本事件受傷逃亡，土地被總督府沒收（參浦忠成 2001；中村勝 2003: 271, 312；胡家瑜、林欣宜 2003；山路勝彥 2011: 225-71）。

展開的「圈地圈生」的總體狀況。在統治初期登場的「隘勇線」，對土地和生活的圈地圈生，使原收奪可視化和體現，即是殖民暴力的一個裝置。⁹對臺灣原住民的收奪，不只是對土地而已，而是對原有生活整體（「主體自然」），中村稱此為「生活的原收奪」。「圈生」或原收奪，在實踐上包含了改造生活習慣、社會組織、信仰、美學價值，即文化總體的改造，是與上述的「圈地」表裡一體的。¹⁰同時，建立「圈地圈生」知識論基礎的是，如同本文第一節討論，人群分類即殖民差異的問題。

3. 殖民國家資本（原始積累國家資本）

「國家資本」對日本資本主義之確立所扮演的角色，過去多半只侷限在（狹義的）經濟史領域中討論（例如海野福壽 1977），中村勝（2009: 92）所說的殖民國家資本，是把這個「國家資本」從廣義的歷史人類學觀點、以及處於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原住民主體自然的觀點，進行重新詮釋，那是包括被稱為「政商」與國家勾結的民間資本之「總資本」概念，也被稱為「原始積累國家資本」（原文為「原蓄國家資本」）。在過去的「日本經濟史」中，國家資本的代表性包括：以軍工廠為代表的軍事投資、與軍事有關聯的鋼鐵和機械等重工業資本、運輸部門的鐵路投資和鐵路國有化（1906年）、金融部門的政府出資銀行等（松元宏 1977）。

關於日本的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兩者對殖民地臺灣經濟的掌握，石井寬治（1976: 228-9）簡潔整理如下：(1)官設臺灣縱貫鐵路，把原來北部（茶業）中部（稻作）南部（糖業）的分割狀態，使之結合於對岸大陸的經濟統一，促使臺灣向日本經濟圈的編入。(2)金融方面，臺灣銀行於1904年發行金幣兌換的同行銀行券，完成了將臺灣編入日本的通貨圈。(3)總督府實施鴉片、樟腦和鹽巴的專賣制，推動土地調查事業，並於1904年斷行收買大租權和加徵地租，使得臺灣財政在1905年達到獨立。(4)民間資本對金礦的投資，由田中長兵衛和藤田組等推行。至於糖業，1900年設立的臺灣製糖是由三井物產、

9. 關於隘勇線，參中村勝（2003: 368, 2009: 384-454），中村平（2013b）。

10. 這一點承蒙審查委員的意見，在此表達謝意。

皇室和臺灣人糖商陳中和等出資成立，而1907年恐慌前後成立的明治製糖及大日本製糖等，壟斷了臺灣市場，實現了日本資本的糖業支配。¹¹ 包括「理蕃」的總體性殖民統治，就是在這種國家和民間資本對殖民地臺灣進出中，由殖民國家資本所推動的。

此中村的殖民國家資本概念，可以說補強了村上勝彥（1977: 179），他曾提出如下的架構性理解。臺灣統治的課題對日本而言，異於朝鮮，以沒有日本的經濟進出這種「白紙」狀態，面對18世紀中葉後大陸商人高利貸資本對臺灣的滲透、以及1858年後以開港為一個分期，英美商業資本對臺灣經濟的支配等之狀況，需要把臺灣經濟急速地重新編入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結構。這個重編，只能在沒把握預期國內民間企業投下多少資本的狀況下進行，打開狀況的關鍵，在於國家資本和總督府強力的經濟政策上，另外在於彌補經濟力量的政治支配上。國家經濟活動扮演的角色較大的，不是資本主義形成和確立過程中的日本，或者階段性進行殖民地重編的朝鮮，而可能是臺灣。

例如日本統治初期，三井可說是北部臺灣「蕃地」裡最重要的企業體，1896年設立臺北支店（三井物產合名會社），1907年開始積極地著手樟腦業，1909年獲得「蕃地」3萬餘甲的林野利用權。李文良（2001: 118-40）把這些狀況描寫出：總督府使隘勇線前進，三井取得林業權，這就是殖民國家和日本企業緊密的協調關係。另外黃紹恆（1998）指出，日本資本強力地進出臺灣的時期為日俄戰爭（1904-1905年）後，呼應上述村上勝彥（1977）的主張。

關於中村所謂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村雖然使用「原始積累期」的時代區分用詞，但實際上同時把上文所述Walker的主張放入其視野，亦即「不斷地對外收奪，與對外暴力之過程」。《捕囚》重新檢視R. Ruxenburg的概念進而指出，原始積累過程不只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生成期的「原始積累期」而已，而是「持續地把非（前）資本主義領域的自然經濟收回於法則的過程」（中村勝2009: 86）、「對內外的非（前）資本主義領域，之後也不斷地行使政治上、國

11. 石井寬治（1970, 1991）把日本產業資本的成立，求於1907年前後。另外，東嘉生將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分為四期，參黃紹恆（2010）。

家的、經濟上能力一連串的暴力方式」(同上引: 91)。這與Walker的資本主義批判相互呼應。¹²

(三)「理蕃」中「半封建性」的問題

自從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1977[1934])指出晚出發的日本帝國資本主義中「半封建性」的問題後,日本學界繼續討論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中「半封建性」或「封建遺制」的問題(例如參石井寬治 1991)。明治國家體制,可以說是通過傳統達到近代化,而不是(「革命性地」)反抗從前的傳統; A. E. Barshay稱此為「新傳統主義」的近代化形式(Barshay 2007)。

中村的《捕囚》實證了,在殖民地臺灣的「理蕃」中,半封建性或前近代性乃其核心。¹³ 其「半封建性」,在強迫賦役勞動(德語Fron, labour service, 中村勝 2009: 120)的同時,又將原住民編入國家體制中這點上很顯著。「理蕃五箇年計畫事業」的暴力鎮壓之後,1910年代後半開始,對「南澳」「溪頭」群的強制「出役」,等於是強制實施低工資勞動(中村勝 2009: 460–570)。¹⁴ 殖民地原始積累國家所進行的原住民勞力政策,在資本、雇用勞動關係之內,創出封建性、前(資本主義)期的、身份制「奴的從屬關係」與「賦役勞動」的形態;為了獲得原住民剩餘勞動,很積極地活用這個關係(中村勝 2009: 106–7)。「奴的從屬關係」的文化裝置就是天皇制的問題,對原住民灌

12. D. Harvey (2007, 2012) 將馬克斯原始積累概念重整為「掠奪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進而分析它在21世紀也持續著。掠奪積累指的是,「原來存在的財貨」或者共有財產,「做為勞動力或貨幣、生產能力、商品」強迫地蒐集,「成為資本而被流通的過程」(Harvey 2007: 92),「為了資本主義體系保持某種的表面上安定性」,需要維持總體性原始積累=掠奪積累(同上引: 117)。

13. 此點呼應著山崎隆三(1989),他批判日本經濟史認為把「半封建性」視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他說:「近代地主制度的本質,不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意義上的封建性質,而是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由明治維新脫離封建社會的約束,適合資本主義而擴大發展」,「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從明治中期到第一次大戰左右的階段,互相依賴的程度是最大的」(同上引: 127)。

14. 「南澳蕃」「溪頭蕃」(殖民者的用詞)分類的歷史問題,參洪廣冀(2006)的詳細討論。

輸「現在的生活是託日本／天皇之恩」的意識，與「皇民化」教育的問題息息相關，也是「理蕃」中「半封建性」的問題。¹⁵「天皇」之「傳統」，在「理蕃」中重新（Barshay 所謂的「Neo」）再編。

《捕囚》一書指出，原住民賦役雇用勞動化的歷史過程。宜蘭廳下「蕃人工資（原文為勞賃）指定」（1918年）確定了，侵入「蕃地」內資本事業的警備或物資運送等勞動標準，也是在這時期勞役開始成為懲役、懲戒的手段（中村勝 2009: 508-9），後來發展成作為「生活改善」的理由之一。由於1918年的飢饉引發貧困，為了其救濟事業，低工資出役開始（同上引: 510）。「*Gaogan* 蕃」卡拉社等遷移至崙埤仔（1919年），規定開墾結束後，每10戶中要派1人每天到駐在所出役，即服官方的勞役（同上引: 531）。關於兵役，在1920-1921年新竹州竹東郡「霞喀羅蕃」發生抵抗運動時，大隘社、十八兒社、及「*Gaogan* 蕃」的人被使役成「蕃人游擊隊」（同上引: 532）。1919年「南澳蕃」地域從「スタヤン」到「リヨヘン」間長28公里的道路開工時，南澳各社原住民也被當作勞工（同上引: 541）。這些可說是雇用勞役、集團出役。賦役勞動指的是，上面所看到的勞役、出役、兵役中的「役」。如此，「理蕃」是，利用原住民「活生生（原文是「生（なま）」）」的自然生命力，將其剩餘勞動以義務賦役的形式當作地租支付，並以他們生存「必要」為理由，將之「置放」於資本－國家制度的過程（同上引: 275）。

（四）自然主權的侵害與圈地圈生運動

在此整理，上面看到中村《捕囚》的圈地＝原收奪，與近年圍繞臺灣原住民自治的討論中「自然主權（的侵害）」概念的差異。「自然主權」概念乃產自當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中，而非從西方直接翻譯過來。¹⁶ 據石垣直（2011: 274-5）的整理，自然主權概念早在1993年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中出現，接

15. 有關這種「庇護」和「恩」，綢仔絲萊渥口述（1997）、中村勝（2003: 373-426, 2009: 561, 576, 601）、中村平（2001）等的研究已經累積起來，在日本殖民主義和去殖民的關係上，筆者將會另文討論。

16. 這是拔尙（蕭世暉，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發展中心，博士課程）的教示，參官大偉

下來1999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和原住民族各代表締結「原住民族和臺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時也曾出現，但至今依然是不能明確定義的概念。石垣認為，此概念可說相當於在舊英國殖民地諸國中，常被討論的先住權、或者其各種權利法定根據的Native Title（日文翻譯為「先住權原」），¹⁷ 換言之，身為土地常住者，先天（應該）擁有的權利以及其根據。這雖是在國際法裡有關「民族自決」或「身為行使主權或自決權的主體之民族」討論中的概念，但強調的是，在國家成立前就在臺灣生活的原住民，與國家對等的關係。

自然主權概念包含近代「主權」概念，在「原住民族和臺灣政府新夥伴關係」中也看得到，它把其權利主體置於「民族」上。中村《捕囚》則並不積極地根據這種近代法和近代主體概念進行討論，反而迴避之，進而把「民族」（nation）從「民屬」（德語Volk）的觀點重新詮釋。¹⁸ 這指的是一種意志的表現，與其說在「民族」和「主權」的近代國家遊戲規則裡鬥爭，不如說是再一次回到「民屬」的樣態，進而構築社會和文化。

解開中村所謂「圈地圈生」的殖民主義指的應該是，解開國家和國族主義的論理。在這一點上，中村所呈現出的思考，較接近《千高原》中討論的「成為少數者 minor」（Deleuze and Guattari 2010: 237–45）。如果把「自然主權」概念不只放於近代國家遊戲規則中，而能把「與國家對等」的邏輯重構於重組國家遊戲規則，這將與中村的討論（拉馬達星星提示「我們的領域」的問題）契合。

（2014）。另，羅永清（2014）則將自然主權英譯成Natural Sovereignty，認為它是成為臺灣本土和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理論基礎的重要概念。

17. 中文對此概念似乎尚未有適當的翻譯詞，有的翻譯為「原住民土地權」，但此翻譯無法表達right和title的意義差異，因此本文保留之。

18. 村田陽一區別並翻譯為「民族」（nation）與「民屬」（德語Volk），是他在翻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日譯版1954年）裡，中村繼承之（中村勝 2009: lvi, 299–300）。

三、殖民差異概念與人類學知識

(一) 坂野徹提出分類「政治性」的問題

重新詮釋馬克思和Ruxenburg的資本積累概念，而試圖釐清「理蕃」史的《捕囚》，與可說是以殖民主義知識論為基礎的Walker殖民差異概念，「捕獲」原住民在國家－資本的內部，本節試圖接合這兩者。中村所謂「圈地圈生」，除了是物理性狀態，同時也是知識論問題，也就是它形成了殖民－國家資本進行統治的平臺。當我們結合中村勝和G. Walker的想法，再來思考「被統治」的「蕃人」概念時，我們需要探討殖民差異概念和人類學知識的重疊，首先看坂野徹（2005）提起的問題，即看似觸及問題的核心。¹⁹

清朝時期出現的「生蕃」和「熟蕃」兩大區分中，其實還有「未熟蕃」、「化蕃」、「合蕃」等之中間型態，但是總督府的行政區分消滅了這種中間型態，簡化為「生蕃」（「高砂族」）和「熟蕃」（「平埔族」）的兩大區分。接著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出版的《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1935），結果按照總督府的行政區分把「賽夏」分類於「高砂族」內。對於這種坂野的討論，山路勝彥（2011: 13）以「人類學者的學術分類，並沒有從屬於行政區分；總督府的行政區分和學術分類，是個別處理不同的問題」試圖反駁坂野。但是筆者認為，行政區分和學術分類的問題，都站在殖民主義知識論的平臺上，山路並沒有分析到這點。

關於「賽夏」的分類，1913年後臺灣總督府把賽夏族分類於「蕃族」，陳文玲（1998）認為，這是由於隘勇線劃下內外之界線，完全是「統治上的方

19. 上文提到洪廣冀說：現宜蘭縣蘭陽溪林業開發時確定利權，殖民政府與此關聯之下，區別「民」和「蕃」等「不同人群」，進而控制此居民和森林的關係（2006: 348）。洪文沒有明確使用「殖民差異」的概念，但從其觀點可看出他關注了殖民國家和資本主義發達關係下人群分類的問題。

便」。²⁰ 由此來看，伊能嘉矩或森丑之助的學術分類不被採用，總督府乃獨自畫線之事實，也許就是意味著，山路所說與人類學者不同的邏輯運用。但是後來《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1935）把賽夏當作「高砂族」之事實讓我們得以推測，誠如坂野所說，總督府的分類和學者的分類具有較大的相關性。當馬淵東一在1986年的會談中，被問及《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把賽夏分類成「高砂族」的理由時，他說：爲了做綿密調查，「沒有錢；沒有人員；所以我們無法處理這種問題的判斷」（宮本延人等 1987: 136）。²¹ 當時談話的主持人松澤員子，接著馬淵的發言說：「基本上沿著之前政府的分類，（中略）最後把賽夏編入在高砂族，是吧」；馬淵也並沒有反駁（同上引：139）。在此看到的情形，不是山路勝彥（2011）所說殖民行政和學問的獨立性，而是學問分類之從屬於「統治上的方便」（陳文玲 1998）。

上述坂野徹（2005:253）的討論提出了，分類行爲所擁有的「政治性」、或者「人類學知識」本身內在的殖民主義問題（同上引：3）；筆者認爲這個部分正需要進一步的釐清。這個「政治性」，其實與Walker所討論的殖民差異概念有關，創造差異概念時開啓的統治知識論，也就是坂野所說的殖民主義問題。²² 本文從Walker提起殖民差異的概念和討論開始，再以「殖民統治如何可行」的觀點，討論在臺灣的人類學知識問題。

（二）富山一郎、陳偉智的議論與殖民差異

明治時期日本人類學成立的背景，呈現出一種分裂的狀況。一方面由西方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將日本人當作被觀看的客體；另一方面日本也建立起

20. 在此我們雖然可以推測南庄事件（1902年）和總督府「蕃族」分類的關聯性，但詳細情形仍有待發掘相關史料來證實。

21. 研究賽夏的宮本延人說：是否把賽夏分類成「高砂族」，是「列入在哪一方感覺都可以」，「調查後認爲還是灰色」，但最後還是將之「列入在生蕃」（宮本延人等 1987: 138-9）。

22. 殖民主義或殖民論述指的是，殖民者單方向地建構有關被殖民者的知識論，並且否定與描述對象的實踐關係（酒井直樹 1997）。

自身的人類學觀察主體。換言之，在「西方」的視線裡，本來身為客體而被陳列的「日本人」，「抵抗這種分裂，以自己的視角重新發現作為領土的日本」(富山一郎 1994: 41)，亦即當時日本人類學在世界帝國主義結構中位置。領有臺灣後，日本人類學對臺灣住民所採取的位置，可以說就像是西方人類學對殖民地他者所採取的，觀察且分類的位置。

殖民差異如何發現，如何確定。日本人類學從剛領有的臺灣著手，對島內住民進行分類，富山一郎則將其分類技法視為其問題意識。這裡的問題，並不是人類學者作為組織政策角色是否參與殖民主權支配；而是富山把分類技法問題化，其實是在探究貢獻於統治的知識，這是知識論的問題。明治時期日本人類學出現的測量技法，把「帶有危機的不可分類的存在」，透過翻譯來重新設定於某個限定的「連續面」上(同上引: 39-40)。富山議論的對象為，日本人類學身處正在擴大中的帝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殖民差異的發現、翻譯與確定。

當我們思考帶來臺灣「理蕃」知識論的殖民差異時，需要參照陳偉智(2014, 2009)對在臺的日本人類學「人種分類」的知識產生和其性質的討論。陳氏指出，討論在臺灣的人種分類時，不可不論及1895年11月渡臺，積極從事臺灣原住民研究的伊能嘉矩(1867-1925年)。因為，伊能所創的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體系，即成為後來總督府對「蕃情」知識的架構。陳氏認為：伊能的人種分類受到當時西方人類學知識論的影響，且並沒有超越它。伊能根據中文文獻記載和自己的田野調查，在1898年把「臺灣土蕃」的「種族」分類，分於「群—族—部」的樹狀系統分類，²³且都歸類於「馬來人種」，即Walker所謂種差性的圖表化。1895年伊能曾說過：臺灣的人類學，是為了「將來的治教」之需，而必要存在的。1900年的《臺灣蕃人事情》中，他依據進化論，認為北部山地「Atayal」為進化程度最低者，靠南部平地的「諸族」進化程度則較高。他假設且分類內部具有同質性的「族」，並在地理範圍上設定各族間的界

23. 例如，第一群「Atayal」—族「Atayal」—部「Tangare-Atayal」等。洪廣冀(2006)指出：這種知識論，經由1935年的《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延續下去，例如泰雅人廖守臣(1984)提出的分類體系，也呈現出中華民國體制下繼承了差異的分類。

線，將文化差異視為進化發展的順序。然而，這種分類的知識論，是後來J. Fabian (1983) 當做「共在性 (coevalness) 的否定」而批判的。

陳偉智 (2014, 2009) 認為，伊能創出殖民論述，使殖民統治的現狀合理化，也包含著分類行為的政治性，同時此論述在知識和政治上，是個新主體建構的嘗試。伊能人種分類的範例，至中華民國體制後直到現在，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伊能分類的範例，雖然有了些數量和內容的變更，但是立志「某某族的某某研究」的學界、或者以「民族」為文化復興單位的原住民族運動，皆繼承了這種典範。如此，19世紀中葉後普及於西方的近代知識架構，便以日本的殖民統治為其代理人，出現在臺灣。

如果將陳氏論述接合於Walker的觀點，我們可以將伊能這種臺灣原住民進化論式的認知範例理解為，它提供了殖民統治知識論基礎或者平臺。²⁴ 上述富山所謂的「連續面」才是這個平臺，就是在這平臺上，把差異翻譯成可以認識、可以比較的東西，即Walker所謂的種差性，臺灣原住民被國家-資本捕獲了。殖民統治在這個平臺上得以開展。坂野徹和山路勝彥在對殖民統治與人類學知識上的討論（或齟齬），是在如何評價行政和學者之間的臺灣原住民分類有時不同。但是筆者認為，其實行政和學者兩方，在把臺灣住民「如何分類、如何掌在帝國內」這一點上，都有其共享的殖民知識平臺。

四、「理蕃」中殖民差異的實體化與「成為日本人」

上述的殖民差異，透過國家意識形態裝置之教育、社會教育和授產政

24. 關於明治期至大正期實施的政府和準政府機關・團體對臺灣原住民的調查，可參小島麗逸 (1979, 1981)。這種殖民差異的分類，是於臺灣全島展開的戶口調查（相當於人口普查）和戶口制度的實施中被實踐且實體化的。關於1905年的戶口調查（扣除「蕃地」部分），「種族」被想像於與語言一對一構成的存在，參富田哲 (2007)。松岡格 (2014) 釐清，各種戶口制度的展開中，「種族」項目一向存在著，而且此分類和登記的制度，與統治的技法相關連。松岡所說的人的「可視化」，即是本文所說（殖民）差異的翻譯。

策、以及戰時體制的總動員而被實體化；「理蕃」在此殖民差異的實體化中，乃重疊於「成為日本人」（皇民化）的過程（參荆子馨 2006）。從《捕囚》一書我們可以發現，賦役與直接交換的勞動方式，各別成為「國民」義務的「兵役」和「納稅」的代替物，在此框架下企圖達成原住民的國民化＝日本人化（中村勝 2009: 274）。另外，在此需要看到同化中歧視的問題，即 Wu Rwei-Ren（2003）稱為「差異性編入」（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的問題，以及人種主義問題（松田京子 2014）。使這種暴力結構可行的裝置與機制，是把前近代天皇重現建構成新的天皇制，以及在天皇制度下賦（役）於臺灣原住民種的「役」，就是本文在第一節（三）所討論的「理蕃」中「半封建性」的問題。「日本／天皇的庇護（御陰）」、「御恩／恩惠」意識透過教育滲透，即為皇民化。

差異的實體化，是知識論取代存在論。這裡重疊著上述國民化和皇民化的問題，它與本文一向指出的資本動態有關。萱野稔人（2005）檢討《千高原》說：「所有國家在面對資本主義時，都傾向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就是勞動和資本能自由地流通的場所。國家為了在世界性抽象且普遍的公理體系下徵收財富，首先需要通過組成統一國內市場的『同質性國民形態』。」（同上引：256）

但是此殖民差異的實體化，並沒有貫徹到底。「成為日本人」與「大東亞共榮圈」，因為日本戰敗而一起崩潰；其次等待臺灣原住民的是「成為中國人」；1980年代高揚的「臺灣原住民族運動」中，原住民重新訊問自己的認同，並在追求去殖民的同時，主張社會中的位置和權利。例如，Paclabang Danapan（孫大川）便與民族的本質主義性構築保持著距離，他提到阿美民間學者 *Lifok*（黃貴潮）對「泛原住民族」意識的生疏感和期待：

我是宜灣〔臺東縣成功鎮〕的阿美，實際上我真的理解的，只是我宜灣部落而已。我看到宜灣的變化，熟知這裡的風…我更不完全知道「阿美族」。什麼，誰叫「阿美族」？太抽象了。你們年輕人做的新名詞「原住民」，喔，我真的不懂你在說什麼（笑）。誰是「原住民」？（Paclabang Danapan 2012: 159-60）

Lifok 很明白表現出對「泛原住民族」意識的疑慮，同時我們也感受到 *Lifok* 對宜灣部落的心情。一方面推動以「民族」為主軸的政治，但不斷地從自己本身的經驗和身體，反省其民族主體。若使用中村勝的用詞（第二節（四）所論及的民族和民屬），去殖民運動，可說是把作為 Volk 民屬的內容，填充給 nation 民族之框架（概念）上，這是一種賦與意義的實踐。這種實踐連接於，在今日臺灣原住民中被當做課題（包括母語）的民族教育（即民屬教育）的問題。如此看來，「理蕃」和其後所進行國民化過程中形成的主體，以及殖民差異的經驗，不是以國族主義的邏輯，而是以每一個別的人用自己的語言來描寫的。如此思考，對如下的問題，也許有了一個程序：何謂臺灣原住民圈地圈包生活和原始積累暴力的記憶和經驗？何謂日本殖民國家－資本的殖民化的暴力記憶和經驗？不是依靠國族主義的邏輯，如何能談？想起文章開頭，拉馬達星星「我們不會為了別人服役勞動」之主體自然的思考。超越國家和國族的「我們」編織出來的去殖民運動，是在理解圈地圈生過程的結構性，以及分享殖民支配暴力經驗的記憶，這兩者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由此可進一步超越且轉位一脫臼（dislocate）²⁵ 殖民差異的國族性實體化，去殖民運動也增殖新的去殖民空間。

參考書目

小島麗逸

1981 日本帝国主義の台湾山地支配：対高山族調査史（その2）。臺灣近現代史研究 3: 5-22。

1979 日本帝国主義の台湾山地支配：対高山族調査史（その1）。臺灣近現代史研究 2: 5-29。

山田盛太郎

1977[1934] 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における再生産過程把握。東京：岩波書店。

25. 關於轉位一脫臼（dislocate）概念，以及其對自由的關係，參考了酒井直樹（1997: 157, 169）和 Laclau（2014: 97）。

山崎隆三

1989 近代日本經濟史の基本問題。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山路勝彦

2011 台湾タイヤル族の100年：漂流する伝統、蛇行する近代、脱植民地化への道のり。東京：風響社。

中村平

2013a 「困難な私たち」への遡行：コンタクト・ゾーンにおける暴力の記憶の民族誌記述。刊於コンタクト・ゾーンの人文学IV 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田中雅一、奥山直司編，頁30-54。京都：晃洋書房。

2013b (書評) 山路勝彦著《台湾タイヤル族の100年》。日本学報32: 165-173。

2011 受動的実践と分有：中村勝の台湾先住民族の歴史経験の記述をめぐって。日本学報86: 297-311 (韓国日本学会)。

2001 國家意識的誕生：泰雅人的日治殖民經驗與當代歷史追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村勝

2012 自然力の世界。東京：れんが書房新社。

2009 捕囚：植民国家台湾における主体的自然と社会的権力に関する歴史人類学。東京：ハーベスト社。

2003 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緑蔭書房。

戸邊秀明

2008 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と帝国史研究。刊於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頁55-88。東京：アテネ社。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

1989[1928] 理蕃誌稿(第四卷)。東京：青史社(復刻)。

石井寛治

1991 日本經濟史(第2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6 日本經濟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0 日本資本主義の確立。刊於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頁171-21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石垣直

- 2011 現代台湾を生きる原住民:ブヌンの土地と権利回復運動の人類学。東京:風響社。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

- 1900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総督府文書課。

坂野徹

- 2005 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一八八四~一九五二年。東京:勁草書房。

李文良

- 2001 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村上勝彦

- 1977 日本帝国主義と植民地。刊於近代日本經濟史を学ぶ(上),石井寛治等編,頁176-194。東京:有斐閣。

官大偉

- 2014 原住民族土地權的挑戰:從一個當代保留地交易的區域研究談起。考古人類學刊80:7-52。

松元宏

- 1977 国家資本と財閥資本。刊於近代日本經濟史を学ぶ(上),石井寛治等編,頁137-156。東京:有斐閣。

松田京子

- 2014 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東京:有志舎。

松岡格

- 2014 日本統治下台湾の身分登録と原住民:制度・分類・姓名。刊於臺灣原住民研究の射程:接合される過去と現在,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編,頁33-75。臺北:順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館。

洪廣冀

- 2006 林野利權的取用與控制、人群分類及族群:以蘭陽溪中上游地域爲中心(1890s-1930s)。刊於族群與文化:「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許美智編,頁243-376。宜蘭:宜蘭縣史館。

胡家瑜、林欣宜

- 2003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177-214。

宮本延人、瀨川孝吉、馬淵東一

1987 台湾の民族と文化。東京：六興出版。

徐如林、楊南郡

2010 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臺北：南天書局。

浦忠成

2001 日阿拐。刊於臺灣原住民，莊永明編，頁72-79。臺北：遠流。

海野福寿

1977 原蕃論。刊於近代日本經濟史を学ぶ（上），石井寛治等編，頁2-25。東京：有斐閣。

荊子馨

2006 成爲「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

酒井直樹

2007 翻訳というフィルター。刊於岩波講座哲学第15卷，飯田隆等編，頁181-211。東京：岩波書店。

1997 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東京：岩波書店。

富山一郎

1994 国民の誕生と「日本人種」。思想845: 37-56。

富田哲

2007 台湾総督府の「種族」・言語認識：日本統治初期の人口センサス・戸口調査・通訳兼掌手当。刊於植民地の朝鮮と台湾：歴史・文化人類学的研究，崔古城ほか編，頁115-148。東京：第一書房。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臺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種学教室。

陳文玲

1998 「サイシヤット」の民族名称に関する一考察。台湾原住民研究3: 178-196。

陳偉智

2014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 1-35。

黃紹恆

2010 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施政權限、經濟學與史料。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

1998 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2: 165–214。
萱野稔人

2005 国家とはなにか。東京：以文社。
廖守臣

1984 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臺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熊野純彦

2013 マルクス 資本論の思考。東京：せりか書房。
網仔絲萊渥口述，中村勝、洪金珠著

1997 山深情遙：泰雅族女性網仔絲萊渥的一生。臺北：時報出版。
羅永清

2014 自然主權：臺灣原住民運動。刊於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
田貴芳著，無頁碼。臺北：翰蘆。

Barshay, Andrew E.

2007 近代日本の社会科学：丸山眞男と宇野弘蔵[The Social Sciences in
Modern Japan: The Marxian and Modernist Traditions]，山田銳夫譯。東
京：NTT出版。

Harvey, David

2012 資本の〈謎〉：世界金融恐慌と21世紀資本主義[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森田成也等譯。東京：作品社。

2007 ネオリベラリズムとは何か[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本橋哲也譯。東京：青
土社。

Laclau, Ernesto

2014 現代革命の新たな考察[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山本圭譯。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 P.

Engels, Friedrich Engels

1954 家族、私有財産および国家の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村井康男、村田陽一譯。東京：大月
書店。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 2010 千のプラトー：資本主義と分裂症（下）[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Editions de Minuit]，宇野邦一等譯。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Marx, Karl

- 2005 資本論（第一卷下）[Werke]，今村仁司、三島憲一、鈴木直譯。東京：筑摩書房。

Pratt, Mary Louise

-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Danapan, Paclabang 孫大川

- 2012 台湾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文学論[臺灣 Ethnic Minority 文學論]，下村作次郎譯。浦安：草風館。

Sakai, Naoki and Jon Solomon, eds.

- 2006 Translation, Biopolitics, Colonial Differe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 Press.

Walker, Gavin

- 2012 現代資本主義における「民族問題」の回帰：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研究の新たな政治動向[The Retur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Political Direction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葛西弘譯。思想1059: 122–147。
- 2011a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lements of the Debate in Japanese Capitalism. Interventions 13(1): 120–137.
- 2011b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 On Marx and Schmitt. Rethinking Marxism 23(3): 385–404.
- 2010 無理という閾と〈共〉の生産（上）：資本の起源的閾——襞としての労働力[Capital's Originary Threshold: Labor Power as Fold: The Threshold of Excess [muri]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ons]，沖公祐譯。情況第三期 11(4): 120–134。

Wu, Rwei-Ren

- 2003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nclosure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and Life in Highland of Taiwan: The Human Classification and “*Riban*”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State-Capital

NAKAMURA Taira

Abstract

The condition enabling colonialism shaped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for both Japanese and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That “colonial condition” (G. Walker), predicated as it is on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established colonial difference and the process whereby that difference was manifested. In other words, the condition which enabled colonialism by establishing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ruler and the “*Syu/Zoku*” of the ruled is epistemological in nature. The task of formulating this epistemology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lonial state to capitalistic modernit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epistemological platform, colonialism proceeded to translate “pure heterogeneities” which are both critical and difficult to translate. On such a basis, colonialism used a form of *fueki* labor (labor service, Nakamura M.) to stimulate the emergence of a state which commodifies labor. My paper suggests that taking colon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s two strategies: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of colonialism which continues into the present and to *partage* colonial memories, especially violent ones.

Keywords: Colonialism, Enclosure=Primitive Accumulation, (Colonial) State-Capital, *Riban*, Colonial Difference

